

高明士 著

中日文化研究文库

东亚教育圈形成史论

上海古籍出版社

高明士 著

中 日 文 化 研 究 文 库

东亚教育圈形成史论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教育圈形成史论 /高明士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7

(中日文化研究文库)

ISBN 7—5325—3361—1

I. 东... II. 高... III. 教育史—研究—中国

IV. G5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1749 号

中日文化研究文库

东亚教育圈形成史论

高明士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guji.com.cn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75 插页 5 字数 249,000

2003年7月第1版 2003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25—3361—1

K·455 定价:38.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T:64063949

中日文化研究文库

主 编

王 勇

学术委员会

主 任：严绍澍

委 员：马兴国 王 勇 王宝平 王金林

王 晓 平 王 晓 秋 卞 崇 道 汤 重 南

严 安 生 张 竞 陈 振 濂

运营委员会地址：310028 杭州市天目山路 34 号

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

联系人：吕顺长

总 序

王 勇

展呈在您面前的这本著作,是“中日文化研究文库”中的一种。这套文库诞生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每部著作都凝聚着作者对历史的思考,同时寄托着对未来的憧憬。我们期盼在国际化进程日新月异今天,这些著作会给您带来知识的愉悦和人生的启迪,希望您长久地喜欢她、呵护她。

中日两国的交往,就正史而言,始见于《汉书·地理志》,至今已有二千多年历史。长期以来,日本以汉字为媒介,如饥似渴地汲取中华文明,由此积淀而形成自己的文化心态、思维方式、道德观念、审美情趣等,构成日本传统文化之基调,直到今天依然生生不息。如此持续而密切的中日文化关系,涉及到人文社科领域的方方面面,虽然前人对此进行过辛勤的耕耘,然而还有大片处女地有待开垦。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日本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涌现出一批根基扎实、视野开阔的学者,尤其在中日关系史领域,整体上已处在国际学术界的前沿。将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及时公诸于世,是本套文库的宗旨。

日本文化的生成变迁,既有外部的原因,也有内部的因素。就

外部原因而言,除了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之外,还涉及到朝鲜、西域乃至欧美诸国。事实上,7世纪以前,日本主要通过朝鲜半岛摄取中国文化,整个东亚构成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文明环流圈;16世纪以后,先是葡萄牙、荷兰等,继而美国、英国等自西徂东,将日本卷入东西文明交汇的漩涡之中。有鉴于此,包含日本在内的东亚文化及东西文化关系的研究,亦纳入本套文库之主题。

这套文库从2000年7月开始筹划,计划出版40~50种。为了确保文库的学术权威性,我们聘请若干名专家学者组成学术委员会,负责审查鉴定申请资助的书稿。有关具体的申请事宜,可向“深见东州中日文化研究出版基金”运营委员会索取资料。

我们感谢世界艺术文化振兴协会(The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Arts and Culture)会长深见东州先生慷慨解囊,为本文库设立出版基金。深见东州先生本名半田晴久,是一位成功的实业家、著名的国际慈善家、多才多艺的艺术家。深见先生酷爱中国文化,从他的数十部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对儒学和佛学均有相当造诣。

1998年,我应邀赴日本早稻田大学从事遣唐使研究,经畏友梅田善美先生介绍与深见先生相识,此后在学术会议上多次见面晤谈。当他得知中国的一些优秀的日本文化研究著作因经费等原因而无法出版时,主动提出设立基金以光学术。对他的这种“中国情结”和对学术研究的理解,我们除了表示感谢和敬意之外,唯有把这项事业做好,以不负国际友人的初衷和国内学者的厚望。

上海古籍出版社毅然接受这套文库的出版;副总编张晓敏先生亲自参与策划,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2001年5月佳日

序 言

传统东亚教育的特质,简单说,就是实施“庙学”教育制度。庙指孔子庙,主祀孔子,在书院曰祠,主祀先贤。所以学校园地中有庙(祠)的存在,是传统教育特有的现象。历来讨论传统教育,都忽略此一特质。拙书撰述的主要目的,即在于证明此一特质。

教育史在近代已经成为教育学领域中之一专门学问,正如法制史、社会史、经济史等在各该领域的研究一样。但不论何种专门史的研究,既名曰史,其学问已与历史学分不开关系。或许由于此故,法制史、社会史、经济史等均能广泛地引起历史学者们研究的兴趣,唯独教育史似为例外。民国以来,治教育史者绝大部分是教育学者,历史学者并不多,即使是最近几十年来台湾学界的情形,仍有此倾向,诚为美中不足。

历史是一部人类演化的过程,揆诸其要素,不外乎变与常。历史研究就是要从变中去肯定常,从常中去发现变,教育史研究,自然不例外。一部中国教育史,可以说是教育脱离宗教范畴而与政治结合,后来又努力建立其自主王国的历史。但论其结果,可说都没能实现。隋唐时代所出现的“庙学”制度,便是这一特质的说明,却下开一千数百年中国甚至“东亚世界”的教育传统。

庙学制度的成立,证明教育并未完全摆脱宗教的要素,只是其活动的意义侧重在教育而已;虽然在制度上,从隋代以后学校已脱

离主管宗教、礼仪之太常寺的管辖。另一方面,也由于庙学制的成立,使汉武帝兴太学以来,教育沦为政治附庸的特质开始走向独立化,也就是学校园地的神圣化。但因教师为官人,教育目的主要在培植吏才的特质始终不变,要使教育自主化的努力,在传统时代实无法实现。

因此,就历史的发展而言,汉武帝兴太学是变,隋代将国子寺罢隶太常也是变,唐太宗令全国县学立孔子庙,在学制发展史上也是变。如何解释这些变的史实,在既有的研究成果里,尚难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汉唐以来的教育制度,具有下列三项特质:一是儒学教育,一是养士教育,一是成圣教育,其实这三种特质,自汉武帝兴太学以来就已经存在,只是到唐代更为具体化而已,尤其从庙学制所显示的成圣教育,可说是教育理想由抽象变为具象的过程。这些特质,出现于汉代,定型于唐代,发展于宋元明清,更成为东亚诸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特质,这就是历史的常,也就是历史通则所在。

近代西方部分学者对东方传统社会提出所谓“停滞论”,最近更有所谓“近代化论”的提倡。不论何种说法,认为东方传统社会是停滞,显然忽略东方历史发展中之变与常的事实,此说已引起东方学者强烈地批判。停滞论的缺点,在于过分强调历史之常,如专制政治、农业社会等要素。其实历史之常的肯定,是从历史之变中求得,先决条件在于认识历史之变,然后从变之中发现进步要素,进而求得常,此种常之因素方是真实,进而证明历史发展的法则性。不能倒果为因,而一开始便以通则性的观念来解释传统的历史现象。

可惜即连教育史的研究,直至今日都还不免掉入停滞论的深渊。最常见的说法,是以清同治元年(1862)作为中国教育史新旧教育的分界线,此说原则上不误,谬误之处,在于将汉初至清末的

二千一百年间作同一时代性处理,完全忽略此一时期之变的要素,更遑论对历史之变有所解释了。

如上所述,在变中求常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笔者非常重视隋唐时期在教育史上的成就,此事竟常为治教育史者所忽略。笔者以为治中国教育史甚至一般中国历史,在近代以前除了不可忽略从变中求常,从常中发现变以外,更不可忽略中国文化的普遍性。盖近代以前的中国史,其实应当说是“天下史”。此即传统中国的历史,只有天下观念而少有国家观念,所以《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明末遗老黄宗羲说:“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明夷待访录·原臣篇》)在天下观念之下,具体完成天下秩序的地区,就是历史上的“东亚世界”。中国文化的普遍性,至少要在这个地区寻求。文化之中既然具有普遍要素存在,自然有形成文化圈的可能。因此,东亚世界也可说是中国文化圈地区。传统历史如此,可惜民国以来中国史的部分著述,类皆囿限于长城以南中国人活动的历史,对于域外的事业,辄以“武功”、“经营”等字眼叙述,诚未能充分掌握史实,更遑论要克服停滞论的偏见了。

拙作即在此一前提之下撰述,一方面希望能克服停滞论,在方法上乃由变中求常,因而提出隋唐学制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不再以中国本土的教育史研究为满足,进而寻求中国教育文化的普遍性,以及历史世界(天下)的结构,乃提出“东亚教育圈”论。在提出东亚教育圈论之前,先从中国学制与日本古代学制作一比较,由异中求同之后,再来考察同时代的朝鲜、越南(含独立以后的历史)、高昌、渤海等国之学制,从比较研究中,证明诸共同要素的存在是确实的。易言之,从诸国学制之特殊性中求取东亚世界的普遍性要素。拙作可说是先由教育史研究入手的一种尝试。

惟本文所称的教育,实指官学教育而言。盖官学为实施国家

教育政策之场所,由官学教育研究入手,较易了解一国一朝的教育动向,虽然论其实际,官学教育不一定比私学教育发达。为进一步掌握官学教育之实态,又将官学教育的成立,区分为形式意义的学校与实质意义的学校两个阶段。凡是无招收学生入学的学校,均属于形式意义的学校,包括只见令制上规定其制、任命学官而无授徒、建置校舍而无学生入学等,都只能说是成立形式意义的学校而已。例如西晋咸宁二年(276)所成立的国子学、南朝的太学、日本在668年所见的大学寮,新罗在682年所见的国学等。实质意义的学校的成立,必须以招收学生入学施教后始告完成,理论上宜先定其制度,或有其成规,并任命学官,至于有无校舍,非为绝对的条件,惟通常皆有校舍。例如汉武帝之“兴太学”,是以博士弟子径赴旧有的博士官就学,当时尚无“太学”校舍,但仍可视为完成实质意义的学校教育。论学校教育的发展,必须先分辨形式意义的学校与实质意义的学校诸阶段,才能明确地看出学校教育发展的轨迹,进而理解学校的建制与教育的实施往往是两回事,尤其在探讨东亚诸国学校成立的过程,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基本问题。

整个说来,东亚传统教育的要素,不外乎礼与法。礼指学礼,包含礼仪、思想甚至宗教等要素在内;法指法制,也就是律令制,故学制规定于学令,学官保障于唐律。礼与法,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因而由教育史的研究入手,似最能掌握中国文化的本质以及东亚社会的传统。所以教育史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史书百官志或选举志所载的资料,它实包罗各方面,尤其地方志及碑志等材料,甚至史迹考察也是不可少的项目。

拙书原名为《唐代东亚教育圈的形成》,1984年由台北的政府编译馆出版,迄今已逾越将近二十年,该馆已无存货。今承蒙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长王勇先生厚意,改出简体版,同时由原书约四十万字,减半并修正发行,以广求学界方家指正。修正版与原

书的题旨不变,只是拙书所论牵涉范围至广,从教育学到历史学,从中国史到东亚诸国史,并非样样皆为笔者之专长,自知谫陋,浅薄之处,在所不免,敬祈博雅君子惠正,以匡不逮。

高明士 谨识

2002.7.31.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汉唐间学校教育发展的特质	1
前 言	1
第一节 汉魏时代	3
一、所谓“兴太学”诸问题	4
二、汉魏学校教育发展诸特质	12
第二节 两晋南北朝时代	40
一、学令篇目的制定	41
二、国子、太学并立制的成立	43
三、庙学制的创立	51
四、学制多样化的尝试	68
第三节 北齐隋唐时代	74
一、学校脱离太常而独立	75
二、学制体系化的完成	77
三、庙学制的普遍实施	78
第四节 汉唐间教育发展的共同特质	108
一、儒学教育	109
二、养士教育	112

三、成圣教育·····	119
结 语·····	122
第二章 韩国古代的学校教育·····	151
前 言·····	151
第一节 汉领朝鲜时代的郡学·····	151
第二节 高句丽的学校·····	155
一、大学的创置与发展·····	156
二、扁堂教育·····	160
第三节 百济的学校·····	164
一、学校相关的事迹·····	164
二、学校出现的时机——汉山城时期的太学·····	171
三、学校教育的性质与发展·····	172
第四节 新罗的学校·····	177
一、682年创立国学制度、747年创置州学·····	177
二、新罗何以创置学校最迟?·····	181
三、花郎教育·····	184
四、国学制度·····	193
五、专业教育制度的成立·····	202
六、学校教育的实施·····	207
七、新罗国学教育延迟实施的检讨·····	220
第五节 东亚教育圈在韩国的形成·····	224
一、汉字教育·····	227
二、儒学教育·····	228
三、养士教育·····	229
四、庙学制的建立与成圣教育·····	230

第三章 日本古代的学校教育·····	244
前 言·····	244
第一节 日本古代学校教育的特质·····	244
一、中央官学的多样化·····	245
二、得业生制的建置·····	248
三、文章科一枝独秀的发展·····	250
四、地方官学的中央化·····	253
第二节 东亚教育圈在日本的形成·····	255
一、汉字教育·····	255
二、儒学教育·····	259
三、养士教育·····	261
四、庙学制的建立与成圣教育·····	264
第四章 越南古代的学校教育·····	275
前 言·····	275
第一节 北属时期的学校教育·····	276
一、学校的创立·····	276
二、学校教育的发展·····	279
第二节 独立时期的学校教育·····	289
一、国子监与文庙的创建·····	291
二、地方官学的设置·····	296
第三节 东亚教育圈在越南的形成·····	297
一、汉字与儒学教育·····	297
二、养士教育·····	297
三、庙学制的建立与成圣教育·····	302
第五章 高昌、渤海等国的学校教育·····	308

4 东亚教育圈形成史论

前言	308
第一节 高昌国	308
第二节 渤海国	315
结论——东亚教育圈的形成	324

第一章 汉唐间学校教育发展的特质

前 言

本书中所称的学校,特指官学而言,以下均同。所谓官学,指官办教育,即由政府订定一套教育制度,并任命学官专司教职,以教育国家所需的吏才而言。据此定义,中国之官学,当始自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设置博士弟子员制。^①

当然广义的学校,从甲骨文的记载来看,在殷商之际似已出现,但此时偏向于军事目的。^②周代的学校,虽以文事为主,究其实际,只有广义的礼乐教育,^③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文之以礼乐”(《论语·宪问》)。^④到周代为止的教育发展,其最大的特色,便是政教合一、官师不分。^⑤政教合一,是因当时行事以礼乐为重的缘故;官师不分,则指专门学术必于王官求之,凡任官者皆可兼为师之故。《礼记·学记》说:“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又说:“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曲礼》篇也说:“宦,学事师。”此等意思,即指寓君教于师。起初教育的目的,是在学为君;君道则由师而后明,故以师高于君,正如《学记》篇所说:“当其为师,则弗臣(于君)也。”这种特质,以后世的眼光看来,是提示道统高于治统。^⑥

秦统一天下后,实施“以吏为师”的法令教育,并禁止私学。((《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这个教育政策,表面看来似有复古倾向^⑦,但因过于偏狭,并不得古意。秦之错误,在于没能配合统一王权的树立,而由教育予以统一意识形态,并藉设学以培养专制王朝的忠贞干部。“徒法不能以自行”,虽出自儒家所讲((《孟子·离娄上》)),但对于君主谋求巩固统一王权,依然适用。

汉武帝兴太学,其意义是认识循由官办教育以培养吏才的重要;其与周制最大的相异处,在于以学校作为官吏的养成所,礼乐、师教已退为次要的目的。易言之,将教育目的置于政治目的之下,教育遂成为政治的附庸;师(博士)则化为“吏”,教育目的由学为君转而学为吏,昔日以师为君的教育思想,已不复见于秦汉以后的专制时代。职是之故,有识之士,辄引周代典制以厘正当代教育制度之不合理现象,更想进而树立学术王国。一部中国教育史,便是随政治的良窳而浮沉的兴衰史;同时也可说是有识之士为树立道统高于治统,另立学术王国,实现为师不臣于君的奋斗史。

本书所以取汉唐间作为时代的分断点,是因中国传统学校教育的发展,到唐代而定型,此后不过是在唐制的基础上修正、发展。更重要的是四邻吸收中国文化后所出现的“东亚教育圈”,也是完成于唐代,并以唐制为蓝本。因此,要了解传统中国教育的特质,以及传统东亚诸国教育的特质,势非先了解汉唐间学校教育发展不可,尤其是唐代的学制。关于汉唐间之学校教育史研究,中外学者著述已多,笔者不敢掠美;笔者于此只侧重发展过程中诸阶段的特质(即时代的特殊性),以及汉唐间的共同要素(即时代的普遍性)。